

西方哲学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主编◎刘放桐 俞吾金


BS165
5

德国古典哲学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俞吾金 汪行福 王凤才 林暉 徐英瑾◎著

西方哲学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人民出版社

西方哲学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主编◎刘放桐 俞吾金

德国古典哲学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俞吾金 汪行福 王凤才 林晖 徐英瑾◎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 园

装帧设计:闫志杰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古典哲学/俞吾金 汪行福 王凤才 林 晖 徐英瑾 著.

(西方哲学通史丛书/刘放桐、俞吾金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ISBN 978-7-01-7668-3

I. 德… II. 俞… III. 德国古典哲学-哲学史 IV. B5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1762 号

德国古典哲学

DEGUO GUDIAN ZHEXUE

俞吾金 汪行福 王凤才 林 晖 徐英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5.5

字数:595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7668-3 定价:7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刘放桐 俞吾金

由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吸取国内外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编写出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以此总结和促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是一些前辈专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已有过的设想。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极“左”思潮禁锢的解除,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可以有组织、有规划进行的新阶段,许多专家纷纷要求把原来的设想纳入现实日程。1983 年在福州举行的第一届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项目规划会就曾决定,集中国内有关单位的专业力量,共同编撰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并把通史的编写作为课题正式列入国家规划之中。然而,由于参与单位多、观点分歧大等原因,这一课题后来未能按规划执行。原来分工负责编写古希腊罗马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阶段的专家,在从事专题研究和资料编译、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对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性的西方哲学通史终究未能问世,毕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事实上,当我们需要查阅较为详细的西方哲学史读物时,还只能利用考普尔斯顿(F. Copleston)等西方学者撰写的通史。

“九五”初期,复旦大学把外国哲学学科确定为“211”重点建设学

科,要求学科提出大型的研究课题,我们就考虑是否可以利用复旦大学西方哲学学科成员较多、同一单位易于配合等有利条件,独立地编写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会面临很多困难。比如,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还不厚实,教学任务也比较繁重,主要成员均承担着多项研究课题,学术观点上也互有差异。但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编写过《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这样的著作,学科的中青年成员思想活跃,学术上有潜力,凝聚力也比较好,还可以借鉴国内外前辈专家和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作出最大努力,上述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克服困难也是我们更好地取得进步的有效途径。如果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学科能独立完成这个课题,就不光适应了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将使自己在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上更加全面和扎实。学校领导和“211”立项评审专家支持并批准了这个课题。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西方哲学通史》分为如下十卷:《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二十世纪英美哲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二十世纪法国哲学》、《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编写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的计划早已公之于众,得到了许多同行的鼓励。但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多。其中最突出的困难是,编写组主要成员在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方面负荷太重,难以集中精力投入编写工作。有些人也怀疑我们能否进行下去。但我们一直没有动摇。尽管各卷预定的成稿时间有所延迟,但大家都十分努力,估计总体上的时间框架也不会被延误。

下面,就《西方哲学通史》编写中出现的三个全局性问题的处理做一些说明。

一、通史在学术品格上如何定位的问题

众所周知,通史的写作应该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教材,它不仅应该把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容贯通起来,而且应该体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果,应该有自己学术研究上的高度和深度。另外,通史也应该异于断代史和专题性著作的编写方式。后者对局部的对象可以做深入的探讨,甚至可以就某些细节进行反复的辨析和讨论。然而,通史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国家、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多,难以进行深入细致的推敲,倒是更应该重点阐释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编写组成员对此均无异议,但是,由于各卷的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处理的方式也难以取得完全的一致。总的来说,我们要求各卷都从“破”、“通”、“新”三个方面作出努力。所谓“破”,就是打破历年来西方哲学教科书的传统框架;所谓“通”,就是抓住主要思想脉络,把西方哲学演化的不同历史时期贯通起来;所谓“新”,就是结合当代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方法,尽可能对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新的阐释。

二、通史各卷如何保持一致性的问题

起先,我们试图在对西方哲学本质特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解上确立起共识,但是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发现,确立这类实质性的共识是十分勉强的。因为编写组成员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上见仁见智,迥然各异,很难达到观点上的一致性。何况,各卷在写作中涉及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对象,这些对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涉及的人物很多,内容也

很散,《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也涉及许多国家、许多哲学流派和许多哲学家,内容显得更为庞杂。相反,《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涉及的人物就比较少,思想发展的线索也比较清晰。因此,在实质性的观点和方法上达成一致是不现实的,甚至在阐释方式和安排上,各卷也难以达到完全的统一。本来,我们打算撰写一篇数万字的“总序”来阐明我们的哲学史观、哲学史研究方法及对一系列有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理解。但考虑到上面的因素,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

现在这个简短的“总序”只是对编写《通史》的缘起以及编写中存在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作出必要的说明。我们主张并鼓励各卷在写作上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风格,但考虑到它们毕竟是通史的组成部分,因而要求各卷的编写者应该尽可能关注通史在整体上的一致性。除了力求做到上面提到的“破”、“通”、“新”外,在写作体例上也要求尽可能接近。比如,每卷除“总序”外,再设“分卷序”,对本卷的写作背景、主要写作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要作出相应的说明。我们还对各卷之间的“衔接问题”逐一进行研究和讨论,尽可能做到“思路上不冲突,内容上不重复”。有的哲学家的理论具有跨越时代和派别的意义,在相关的分卷中都应当提到,但也要注意不同的角度和详略上的差异。

三、通史各卷如何布局、如何厘定相互关系的问题

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长段时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分期,虽然国内外哲学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划分,但对其历史发展线索的处理大多比较相近。我们所做的改动主要是对17—18世纪哲学的分期和叙述方式作出了不同的处理,即不采用“经验论、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这类传统的划分方式,而是把这个时期划分为“以17世纪为主的形而上学和以18世纪为主的启蒙哲学”这两大块。至于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西方哲学

的新发展,过去曾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而遭到简单的否定。实际上,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个部分乃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最为丰富、也最有现实意义的组成部分。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安排了《通史》的一半篇幅、即五卷的篇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新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在以往的西方哲学的研究中,人们总是简单地把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叙述体系变得残缺不全,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诠释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变得难以索解了。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在《西方哲学通史》的编写过程中考虑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重,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到当代的新发展纳入西方哲学通史的整体架构中去。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在《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卷中,我们对马克思实现哲学的划时代革命的过程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中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危机和新的走向做了全面的论述。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是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学科十多位教师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晶,也是我们向哲学界所做的一个学术汇报、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献上的一份精神礼物。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情况下,《西方哲学通史》的编写依然是一项尝试性的工作。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疏漏、处理不周、甚至错误之处都在所难免,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分卷序

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它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17世纪形而上学和18世纪启蒙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吸纳了传统西方哲学的精华,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深邃、结构严谨、内涵丰富的哲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一批思想大师也在德国哲学界应运而生,正如德国诗人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所说的:“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①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也为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向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20世纪以来的重要哲学思潮,如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无不受到德国古典哲学所蕴涵的问题意识的深刻影响。

然而,对西方哲学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我国哲学界却缺乏相应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已经出版了一些以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译介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的研究作品,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或是囿于传统的见解,无法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客观进程作出全面的、合理的说明,或是缺乏当代意识,未能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意义作出创造性的阐释。具体地说来,在德国

^① 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古典哲学的研究上,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哲学史教科书和研究性著作中,人们通常把德国古典哲学理解为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运动。比如,俄罗斯学者 A. B. 古留加在《德国古典哲学新论》一书中认为:“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费尔巴哈(1804—1872)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位代表,它的光荣的完成,它的坚决的改革家——唯物主义者 and 无神论者。”^①显然,把费尔巴哈视为“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位代表”并不是古留加的观点,而是列宁的观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1913)中叙述马克思哲学时,列宁曾经指出:“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②尽管列宁在这段话中没有列出属于“德国古典哲学”范围的全部哲学家,但他似乎倾向于肯定,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显然,列宁的这一见解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列宁的见解能否作为一个定论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① A. B. 古留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沈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3—294 页。冯契等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分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与德国古典唯物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形成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过程,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形成了德国古典唯物主义的理论。”参阅该书第 922 页。这一见解也可从《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得到印证。该辞典在第 22 页上这样解释“德国古典哲学”这个条目:“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从康德开始,中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告终。”汪子嵩先生等在《欧洲哲学史简编》中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参阅该书,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5 页。杨祖陶先生甚至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把德国古典哲学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第二个阶段则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参阅该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 页。显然,杨先生的观点来自于苏联学者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参阅该书,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0 页。

人所共知，“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概念是由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诚然，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作为一个专门的论题加以讨论，但他实际上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答。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谈到辩证法的三大形态时就指出：“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研究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①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黑格尔哲学时，恩格斯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②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运动，而黑格尔则是这一运动的完成者。显然，按照恩格斯的见解，这一运动并没有把费尔巴哈包含在内。

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非常明确地叙述过自己对德国古典哲学范围的看法，为什么列宁还把费尔巴哈也放进去呢？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然辩证法》作为手稿，于1925年才第一次全文刊登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上，列宁生前并没有读到这份手稿。当然，毫无疑问，列宁读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但由于该书并没有明确地界定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加上恩格斯又用不少篇幅论述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这就很容易产生下面这样的误解，即把费尔巴哈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名成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这实际上是恩格斯一贯的思想。在其早期论文《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1844）中，虽然恩格斯没有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但在提到德国的哲学革命时说：“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致除了上面提到的体系而外，其他任何体系都是站不住脚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8—589页。

至于中国理论界,之所以迄今仍然处于这样的误解之中,或许还有书名翻译上的原因。众所周知,恩格斯原著的书名是:*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翻译 *Ausgang* 这个德文名词。其实,*Ausgang* 乃是动词 *ausgehen* 的过去分词的名词化,而 *ausgehen* 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含义是“外出”或“出门”。所以,*Ausgang* 的最基本的、最常用的含义也应该是“出口”、“出路”或“出门”,但也有“终结”、“终局”的含义在内,因而单从字面上分析,似乎人们把上述书名译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无可厚非。

然而,当我们超出单纯字面的含义,从恩格斯当时写作的特定语境中来考量 *Ausgang* 的含义时,就会发现,上述书名中的 *Ausgang* 只能译为“出路”,而不能译为“终结”。为什么?因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的译法极易产生如下的错觉,仿佛费尔巴哈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而终结者自然是隶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内的。事实上,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费尔巴哈看做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在他看来,终结者的角色只能由黑格尔来担任,所以他这样写道:“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①假如我们打算撰写另一部著作——《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个书名倒是十分贴切的,因为黑格尔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

因此,我们认为,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应被译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只是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被终结后出现的一条新出路或一个新出口。作为“出路”,费尔巴哈哲学已经置身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外了。打个比方,如果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城堡”,那么费尔巴哈已经“走出了”城堡。有人也许会反驳道:既然是“走出了”城堡,不正好说明费尔巴哈原来在城堡之内,即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内吗?我们的回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是肯定的。当费尔巴哈还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时,他的哲学是从属于黑格尔的。在这个意义上,把他归入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内,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范围内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然而,一旦费尔巴哈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也就“走出了”城堡,不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内了。所以,无论如何,在恩格斯当时的语境中,作为独立思想家的费尔巴哈并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内。这就启示我们,Ausgang 这个德文名词的翻译不仅涉及字面上的含义和翻译的技巧问题,而且也涉及对恩格斯思想的理解问题,因而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我们在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关系上的新见解是:成熟时期的费尔巴哈哲学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青年时期的费尔巴哈(作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哲学可以作为黑格尔哲学的附庸而归入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内。

二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复杂性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是相对于“简单化”而言的。不少西方哲学史方面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理解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一单线索的发展进程。显然,这样的理解方式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简单化、扭曲化了。按照这样的理解方式,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17、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常常是无神论者,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则通常显现出深刻的宗教背景?为什么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会形成著名的“同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identity)?为什么在从费希特哲学向谢林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出现了从主观化倾向向客观化倾向的转变?为什么在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身上,体现出批判启蒙思潮的深刻的反省意识?为什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理性(经线)和情欲(纬线)交织的结果?为什么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时间框架内会出现叔本华的唯一意志主义学说及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而这一思潮在尼采和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等

等。所有这些问题,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化理解中都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有趣的是,人们喜欢把单数形式的“线索”(clue)这个词所指称的对象作为比喻引入到哲学史研究中,热衷于谈论“哲学史发展的线索”。显然,这种谈论方式为一种抽象的、单线索性的哲学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史的发展都不是单线索的、简单化的,而是现实生活和各种思想酵素在复杂的互动中实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地志学”(topology)这个比喻,即不是把哲学史理解为一一条或多条线索的交叉运动,而是理解为思想板块的运动。这个思想板块不仅和外在的其他思想板块处于相互作用中,而且其内部的各种思想酵素也处于相互作用中。我们认为,只有把这种新的哲学史观念引入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中,才能再现其真实性和复杂性。我们在这个分卷中所采取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出德国古典哲学得以形成的文化背景。我们不但考察了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德国古典哲学核心理论形成的决定性影响,也考察了路德的宗教改革、牛顿的物理学和英国经验论、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哲学传统、莱辛和赫尔德的启蒙思潮、歌德和席勒的“狂飙突进”运动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二,充分论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不展开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具体论述,只限于论述其思想影响的普遍性和渗透性。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曾经指出:“歌德的全部诗作都充满了斯宾诺莎作品中那种鼓舞人心的精神。歌德终生效忠于斯宾诺莎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他在他的整个生涯里研究着斯宾诺莎;这是他在他的回忆录的卷首和最近出版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里,一直坦率地承认的。我记不清在哪里念到过这样一段话,对歌德这种始终不渝的斯宾诺莎研究,赫尔德曾经不快地喊道:‘如果歌德能拿起一本斯宾诺莎以外的

拉丁文书籍,那该有多好!’然而,这不仅适用于歌德,后来或多或少作为诗人而知名的他的一些朋友,也都早已热衷于泛神论,泛神论在它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在我国获得统治地位以前,实际上早已盛行于德国艺术界了。”^①这段话充分反映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对当时的德国艺术界的巨大影响。在海涅看来,这种影响不仅通过艺术界间接地波及德国哲学界,而且实际上也直接地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家。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谈到谢林时曾经这样写道:“谢林先生借用斯宾诺莎的东西要比黑格尔借用谢林先生自己的东西来得多。一旦有人把斯宾诺莎从他那呆板的、古老的笛卡尔主义的数学公式中拯救出来,使得广大读者更能理解他,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斯宾诺莎比任何人都更该控告别人偷窃了他的思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哲学家,往往自己并不自觉,却都是透过巴路赫·斯宾诺莎磨制的眼镜在观看世界。”^②这段话不仅表明了斯宾诺莎思想对谢林的影响,也表明了他对当时所有德国哲学家的直接影响。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影响也可以从黑格尔下面这段话中体现出来:“斯宾诺莎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不是哲学。”^③这就启示我们,撇开对斯宾诺莎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的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就会变得难以索解。

第三,认真对待德国浪漫派思潮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德国文学艺术领域里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曾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曾对德国浪漫派做了过于狭隘的阐释,即把它理解为“中世纪文艺的复活”^④。其实,浪漫派,尤其是德国的浪漫派,作为对思想

① 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318页。

② 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104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0页。

④ 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据说,奥·威·施莱格利于1812年曾写信给斯太尔夫人说:“中世纪历史和古德文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参阅德·斯太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注①。

领域中的启蒙思潮和文艺领域中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众所周知,施莱格尔兄弟是德国浪漫派理论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但创办了《雅典娜神殿》杂志,崇尚自然、提倡个性解放,主张文学艺术作品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而且译介莎士比亚及古代印度的文学作品,从而在德国人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而德国浪漫派诗人蒂克、诺瓦利斯的作品也体现出与启蒙精神相抗衡的新的思想倾向。毋庸讳言,德国浪漫派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极大地拓宽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视野,影响了其发展方向。正如古留加所指出的:“在德国哲学返回自然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路标,那便是浪漫主义。”^①当然,问题也有另一个方面,即费希特,尤其是谢林的哲学思想也对浪漫派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用说,不对这种互动作用进行深入的探索,就无法展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丰富内涵。

第四,细致地解析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变数,即洪堡兄弟和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如果说,洪堡兄弟,尤其是威廉·洪堡重视对自然、科学、人、社会、国家和语言的探索,那么施莱尔马赫则倡导了一种以直观和情感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神学理论,并以实质性的方式推进了诠释学的发展。显而易见,这些思想酵素也与同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形成了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道路。

显而易见,上述思想背景和酵素的引入,将促使人们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复杂性及其演化动力的多元性,也将促使他们从这些新引入的关系出发去超越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的、简单化的叙述形式,并为那些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找到明确的答案。

三是重估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问题。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界,人们在解答“究竟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时,总是习惯于“两个归结”的思维方式,即把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归结为其集大成者黑格

^① A. B. 古留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沈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尔哲学的遗产,再进一步把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归结为其辩证法。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被稀释化、贫乏化了。它给人们的印象是: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留下其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诚然,我们也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但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思想遗产都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见解显然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本卷的写作中,我们力图纠正这个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占支配地位的错误观点。其实,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会发现,德国古典哲学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实践理性(亦即意志)及“人是目的”的伦理观念;费希特的“行动哲学”及对知识基础的深入探究;谢林的自然哲学、艺术哲学及对人类自由本质的思索;黑格尔的历史意识、市民社会理论及异化学说等等。对所有这些思想遗产,我们都应该怀着海纳百川的心态,全面地、深入地加以发掘,从而重塑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形象,充分阐发它在西方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在本卷的写作中,具体的分工情况如下:俞吾金除撰写分卷序外,还撰写了第一章、第五章;林晖负责撰写第二章;汪行福负责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王凤才负责撰写第六章;徐英瑾负责撰写第七章。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03AZX00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02jazz7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